

清季寓日中国人刻书考述

王宝平

1877年,清廷遣使何如璋,开创了使节驻扎日本之先河。从此,中国外交官以使馆为据点,积极开展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活动。其中,黎庶昌、杨守敬刊刻的《古逸丛书》,数量之巨,版本之珍,引起世人的高度瞩目,迨至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为学界津津乐道。本文拟对明治时期(1868-1911)寓日中国人刊刻的图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在此基础上揭示它的特点,以期对一个世纪前产生的这一文化现象有一比较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本文介绍的图书,虽然在日本出版,但更多地用于亲友间的馈赠,在装帧、版刻上往往保持着被长泽规矩也称作“清刻本”的特色^①。因此,类似《日本杂事诗》(黄遵宪撰,饭岛有年点,明治十三年,东京早乙女要作刊)、《冶梅石谱》(王寅绘,九富鼎校,明治十四年,大阪仓泽枳七刊)等书,虽为寓日中国人的著作,但由于系日本人出版,更具有日本图书的版式特徵,故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明治时期赴日中国人刊刻了不少书籍,现以刊刻者为基本线索,按时间先后叙录如下。

徐承祖(1842-),字孙麒,江苏省六合县人,第三届驻日公使,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至十三年十一月在任,在日期间主要刊刻了下列图书:

《经籍访古志》六卷补遗一卷,(日)涩江全善、森立之撰,光绪十一年(1885)刊。全书按四部分类,医书别为补遗,共著录日本藏汉籍760馀部,所涉版本上自唐人抄本,下至清代刊本,尤以宋元古版为多,较全面地反映了日本江户时期庋藏汉籍善本的保存情况,是一部继《本朝见在书目》后,重要的日本目录学著作。杨守敬等人据此按图索骥,在日本收集了大量的古籍。该书最先发端于狩谷掖斋,经小岛宝素等人的努力,最后由森立之等三易其稿,终成其事。该书在徐承祖的资助下,于光绪十一年得以付梓问世。

《条议存稿》一卷,徐承祖著,光绪十一年(1885)刊。据徐氏自序,本书原为光绪十年由译署上呈御览,后因同人索观者众,经部下陈明远、姚文栋怂恿,

①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序》,汲古书院,1976年。

遂公之于世。全书析为储才、理财、化莠、水陆营制、江海防、洋务和出使,凡7项24条,集中体现了作者对清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的认识。该书翌年增设附录《条陈防御事宜》后,再次推出增补本,并被王之春作为附录收入《国朝柔远记》(上海同文书局,光绪十八年)。

《美英条约》不分卷,四册,徐承祖译,部下杨枢、徐致远校对,光绪十二年(1886)刊。该书收英美两国1797年至1871年签署的有关航海、贸易、国境、渔业、买卖奴隶等条约,为徐承祖驻美时学习英语的教科书,系较早引入中国的西方公法著作。

此外,徐承祖在日期间还为父亲徐鼐出版了4种著作:《周易旧注》十二卷、《读书杂释》十四卷、《小腆纪年附考》二十卷、《未灰斋诗钞》一卷,皆为光绪十二年刊。徐鼐(1810-1862),字彝舟,号亦才,江苏六合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历官福建延平府知府,卒于官。博学通经史,撰述颇富。

据考,徐承祖在日还刊有《通鉴纪事本末》一书,光绪十三年刊。徐承祖跋云:“余衔天子命,驻东三年,公馥搜求古籍,有以是书之版求售者。书非中土所佚,特旧板漫漶,读者病之。是本为海东澱藩知事稻叶君正邦取其藩邸所藏古本翻刻者,洵可珍也。爰购得之,公诸同好”。知东瀛有人出售《通鉴纪事本末》板片,乃据澱藩知事稻叶正邦所藏古本翻刻,遂为徐承祖购得^①。澱藩,即淀藩,位于山城国(现京都府京都市伏见区淀本町)。稻叶正邦(1834-1898)为该藩第12代藩主。明治二年(1869),日本政府实行“版籍奉还”政策,稻叶担任淀藩知事,两年后(明治四年,1871),政府实施“废藩置县”改革,淀藩并入他县,稻叶遂被免,此后倾心于神道教。徐承祖撰跋时,稻叶任神道事务局管长。著有《妖幻夜话》、《东阁遗草》。徐承祖的跋由“日本大域成瀬温书”。成瀬温(1827-1902),字子直,号大域、赐砚堂主人,远江国佐野郡(现静冈县挂川市)人。明治时期书法家,以颜体为宗,曾奉敕书王羲之《集字圣教序》,黄遵宪故居门楣上的“人境庐”三字亦出自其笔。

黎庶昌(1837-1897),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室名拙尊园。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光绪七年十二月至光绪十年十二月被命为第二届使节驻日,光绪十三年十一月至十六年十二月作为第四届公使再度复命。著有《拙尊园丛稿》、《西洋杂志》等。黎庶昌首次出使期间,主要刊刻了《古逸丛书》,第二次出使期间,为李鸿裔刊刻了以下二书:

《苏邻遗诗》二卷,(清)李鸿裔撰,光绪十四年(1888)刊。该书末页题“日本东京田塾町锦四郎刻”,收李鸿裔遗诗2百餘首。

《髯仙诗舫遗稿》二卷,(清)李鸿裔撰,光绪十四年刊。除序跋、墓志铭顺

^①据考,该书板片曾求售于杨守敬,杨氏因资金短缺,后售于徐承祖。见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之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第292页。

序与《苏邻遗诗》相异;未见《行述》和“日本东京田塾邨锦四郎刻”一行外,其余完全同《苏邻遗诗》,当为同一版本。

李鸿裔(1831-1885),字眉生,号香严,又号苏邻,四川中江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曾入曾国藩幕,官至江苏按察使加布政使衔。罢官后,家苏州。精书法,临抚魏、晋碑铭,无不神形毕肖。工诗古文,晚年好佛。

黎庶昌在第二次出使期间,还为本家族刊刻了二种丛书:

《黎氏三家诗词》六种二十五卷,光绪十四年、十五年刊。是书为黎氏一族三人——黎兆勋、黎庶焘和黎庶蕃的诗词集,包括:①侍雪堂诗钞六卷,(清)黎兆勋撰,光绪十五年田塾邨锦四郎刻;②葑烟亭词四卷,(清)黎兆勋撰,光绪十五年木邨嘉平刻;③慕耕草堂诗钞四卷,(清)黎庶焘撰,光绪十四年木邨嘉平刻;④琴洲词二卷,(清)黎庶焘撰,光绪十四年田塾邨锦四郎刻;⑤椒园诗钞七卷,(清)黎庶蕃撰,光绪十五年田塾邨锦四郎刻;⑥雪鸿词二卷,(清)黎庶蕃撰,光绪十五年木邨嘉平刻。

《黎氏家集》十二种三十六卷附录四种六卷,(清)黎庶昌辑,光绪十四年、十五年刊。《黎氏家集》为黎氏家族——黎安理、黎恺、黎恂、黎兆勋、黎庶焘、黎庶蕃和黎庶昌等7人的著作集。较上部丛书多六种:①梦餘笔谈一卷,(清)黎安理撰,光绪十五年田塾邨锦四郎刻;②长山公自书年谱一卷,(清)黎安理撰,光绪十五年木邨嘉平刻;③石头山人遗稿一卷,(清)黎恺撰,光绪十四年田塾邨锦四郎刻;④蛉石斋诗抄四卷,(清)黎恂撰,光绪十五年木邨嘉平刻;⑤千家诗注二卷,(清)黎恂撰,光绪十五年活字版排印;⑥丁亥入都纪程二卷,(清)黎庶昌撰,光绪十四年活字版排印。附录为与黎氏家族有关人士的著作,包括:①青田山庐诗抄二卷词抄一卷,(清)莫庭芝撰,光绪十五年木邨嘉平刻;②悦坳遗诗一卷,(清)郑珉撰,光绪十四年木邨嘉平刻;③瑟庐遗诗一卷,(清)章永康撰,光绪十四年木邨嘉平刻;④昭觉丈雪醉禅师语录一卷,(清)释通醉述;(清)释彻纲等编,光绪十五年刻。

罗嘉杰,福建上杭人,光绪十三年十一月至十六年十二月在第四届公使黎庶昌麾下担任驻横滨理事署理事,回国后曾任苏松常镇粮道,余未详。据考,他在日本刻有以下三书:

《离垢集》五卷,(清)华岩撰,光绪十五年刊。该书为华岩诗集。华岩(1682-1756),字秋岳,号新罗山人、离垢居士,福建上杭县人。自幼酷爱绘画,因出身贫寒,备受世俗冷落,遂发奋自强,离家飘泊,游历四方。后为生计,往来于杭州、扬州之间,专心画事。除山水、人物画外,尤精花鸟,其花鸟又常与虫草并存,极富生活气息,人称“花鸟杂画”。据罗嘉杰序云,因罗氏与华岩同乡,罗的祖上曾有题《山人离垢集诗》二章,以及该书原版稀见,华岩的文章才望有湮没之虞,遂将是书付诸梨枣。

《备急灸法》一卷,(宋)闻人耆年编,光绪十六年刊。光绪十六年罗嘉杰序云:“贵阳陈衡山嵯尹嗜古笃学,尤喜搜石渠金匱之书,曾于扶桑都市得南宋

孙矩卿旧刻团练使张公涣所著《备急灸法》一卷,以畀余曰:此灸法中国不甚概见,盖以世失其传。……良友针砭之投,何敢自秘。爰将原本并余所得《针灸择日编》一并付梓,俾宏流传,亦以副衡山济世深心。此二者流落东瀛,垂数百载,几无知者。今复归之中国,遍起沉痾,庶知广陵散犹在人间也。”可见是书中国亡佚,罗氏得之于陈桱。该书以灸法为主,介绍心痛、牙痛、痈疽、疔疮、腹痛、吐泻等 22 种急证的灸治方法及急救方法,并附简明图说。

《针灸择日编集》不分卷,(明)全循义,(明)金义孙等辑,(清)于希璟校,光绪十六年刊。是书为针灸著作,辑录历代文献中有关针灸选择日时的资料。

孙点(?-1891),字君异,号玩石,又号圣与,别号三梦词人,安徽来安人。光绪十三年十一月至十七年四月,担任黎庶昌和李经方公使的随员,回国途中蹈海而尽。善诗词,热心于诗文交流,在黎庶昌任上编辑出版了 8 种中日唱和诗集^①:

《癸未重九讌集》一卷,(清)孙点编,日本使署刊,刊年未详。收黎庶昌癸未(光绪九年,1883)重阳设宴时,中日唱酬诗什 52 首。

《戊子重九讌集编》一卷附《枕流馆讌集编》一卷,(清)孙点编,光绪十四年刊。收戊子(光绪十四年)九月,黎庶昌及日本友人设宴时中日唱酬诗什。

《己丑讌集续编》二卷,(清)孙点编,光绪十五年刊。由《枕流馆集》、《修楔编》(卷上)和《登高集》(卷下)组成,收己丑(光绪十五年)3 次中日雅集诗什。

《庚寅讌集三编》三卷,(清)孙点编,光绪十六年刊。由《修楔编》、《登高集》和《题楔集》组成,前两集为庚寅年(光绪十六年)黎庶昌在红叶馆张宴唱酬时的诗集,后一集为日方为黎氏饯行,以及黎氏举行告别宴会时的诗作。

《嚶鸣馆春风叠唱集》一卷,(清)孙点编撰,光绪十五年刊。收己丑(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黎庶昌设宴时,孙点和诗 4 首,以及会后吟诗 20 首、众人评跋 50 篇。

《嚶鸣馆叠唱余声集》一卷,(清)孙点编撰,光绪十五年刊。收《嚶鸣馆春风叠唱集》梓行后,孙点收到的国内外和诗 48 首,以及他的新作 8 首。

《嚶鸣馆百叠集》一卷,(清)孙点撰,光绪十六年刊。收光绪十六年春季诗会孙点步黎庶昌旧韵和诗 68 首,加上《嚶鸣馆春风叠唱集》和《嚶鸣馆叠唱余声集》所载 32 首,共得百首。

《樱云台讌集诗文》一卷,(清)孙点编,日本使署刊,刊年未详。光绪十六年四月八日,长冈护美等于上野樱云台宴请黎庶昌等中国驻日使节,是为席间唱酬之作。

陈桱(1850-1939),一作陈矩,字衡山,贵阳人,以军功起家,由监生考取

^①以下唱和集已影印出版,参见拙编:《中日诗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清实录馆誊录,光绪十五年正月作为第四届公使黎庶昌的随员出使日本,翌年十二月瓜期届满回国^①。驻日期间收有大量金石、古籍,刻有以下2书:

《二李唱和集》一卷,(宋)李昉、李至撰,光绪十五年刊。该书北宋刊本,中国久佚,首尾残缺,存自第5叶至第25叶,中间复缺第13叶,缮刻至精。陈在东京斩获后,将之影写付梓,后归傅云龙,复转至罗振玉。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在京都富冈铁斋之子富冈桃华家获见该书日本影宋旧刊本。它与陈刻款式悉同,而残缺处则可互补。于是,罗振玉亟将两书合而为一,共得三十叶,仅脱第十三一纸,予以影写出版^②。

《中说》十卷,(隋)王通撰,(宋)阮逸注,光绪十六年刊。王通(580-617),字仲淹,号文中子。是书用讲授记录的形式保存了王通讲课时的主要内容,以及与众弟子、学友、时人的对话,包括《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和《关朗篇》等。据陈渠序云:“余喜读《中说》而苦无善本。今偶于日本书肆得宋本阮逸注十卷,字画古雅,幸惬夙怀。因重镌之以饷嗜古君子。”

王肇铨,字振夫,元和(今苏州)人,附监生。光绪十一年自备斧资赴日,学习舆地之学,其地理才能得到黎庶昌赏识,于光绪十六年二月至十七年十二月作为第四届、第五届公使黎庶昌、李经方的随员驻日,主要任务为修辑日本沿海地图。著有《铜刻小记》(一卷,1889)、《日本环海险要图志》(二十卷,抄本)、《中俄交界地名表等五种》(十二卷,稿本)、《译文须知》(四卷,稿本),译有《普通体操摘要》(一卷,1900)等书^③。驻日期间刊有以下3种图籍:

《日本四大岛全图》一幅,(清)王肇铨绘,光绪十三年刊。载陈家麟《东槎闻见录》(光绪十三年)卷首,绘北海道、中土(本州)、四国、九州地图。

《日本全国海岸图》一幅,(清)王肇铨绘,光绪十四年刊。载王肇铨《日本环海险要图志》卷首,绘日本七道(东山道、北陆道、东海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以及豆南诸岛、州南诸岛、千岛列岛和北海道地图。

《图形一斑》一卷,(清)王肇铨编,光绪十七年刊。是书记地图中表示道路、铁道、村落等的记号,有图22幅,为近代中国较早介绍地图图式的专业图书。

王惕斋(1839-1911),浙江慈溪人,名仁乾,字健君,号惕斋,晚号独臂翁。国学生,布政使司经历。同治九年(明治三年,1870)赴日,主要从事笔墨生意,系晚清较早东渡扶桑的中国人^④。据考,他先后资助出版了2种古籍,5种新学

①陈渠其他事迹,参考赵藩《灵峰草堂集序》(光绪十九年序刊),以及贵州文献徵辑馆编《贵州文献季刊》(第二、三期合刊,1939年10月,第11页)。

②罗振玉:《二李唱和集跋》,《二李唱和集》,罗振玉宣统三年(1911)刊。

③关于王肇铨,参见拙著:《清代中日学术交流之研究》第七章,汲古书院,2005年。

④关于王惕斋,详参2011年5月复旦大学召开的“江南文化与日本”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拙文《明治前期赴日浙商王惕斋之研究》。

著作。

《缩刻铜版千百年眼》十二卷,(明)张燧著,光绪十四年王惕斋东京刊。该书为晚明一部重要的历史学术随笔集。原有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但流播不广,《千顷堂书目》未见著录。清代以降,则成为禁书,在《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中,更不见著录,几近湮没。张燧明末避乱赴日后,此书在酒井藩重刊,未几毁于战火。三百年后,王惕斋在日本旧侯公家获得初印善本,将之铜版缩刊,使之又重新盛行于学界,广为流播^①。1905年上海史学社铅印本、1995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等,都据王氏刻本。有学者认为:晚期多史论、少史考作品,此书亦考亦论;明代考据之书,多偏重经部、子部,显得博泛,而此书专论史部,且按时代顺序排列,比较专业化。此书洵为晚明史学的杰作,它的发现,可以大大改写明代史学的形象^②。

《汉译诊病奇核》二卷,(日)多纪元坚撰,(日)松井操译,光绪十四年刊。该书记录病名、预后、诊断等内容,系集日本自古以来腹诊学说集大成之作。原书以日语编撰,江户时代天保十四年(1843)成书后,一直以写本形式流传。中国驻日外交官沈文荧、孙点以及游历官傅云龙等人获知后,认为中国无腹诊之说,可补中医问诊之缺,冀望介绍到中国。于是,多纪元坚哲嗣云从的弟子松井操费时十年,克服种种困难,译成汉语,由王惕斋出资刊刻。该书后于1931年易名《诊断学讲义》在大陆出版,1935年题为《诊腹学讲义》在台湾出版,促进了中日医学的交流。

除古籍外,王惕斋还为王鸿年出版《日本陆军军制提要》(1901)、《日本语言文字指南》(1902)、《宪法法理要义》(1902)等,为李宗棠和王宰善出版《日本小学校新令》(1902)、《学校管理法问答》(1902)等。

王鸿年(1870-1946),字世巧,号鲁璠,浙江永嘉人。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光绪二十五年东渡学习陆军,有志未逮,改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学习政治^③。长年从事外交工作,官至驻日公使馆参事官、代理驻日全权公使等,是一名精通日语和法律的外交专家。

李宗棠(1870-1923),字荫柏,一字隐伯,别号江南吏隐,千仓旧主。因军功被举任候补道,在湖北、山西、安徽、江苏等省办理政事,尤以教育、留学两方面任事为多,光绪二十六年奉派赴日考察学务。著有《东游纪念》十卷等。

王宰善,字荃士,上海南洋中学创办人王柳生之子。南洋中学前身松江学塾及育材书塾首批学生。1899年赴日留学,1905年日本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被清政府授以商科举人,以知县分省补用。民国时历任长春交通银行副经理、哈尔滨戊通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汉口造币厂厂长等。著有《普通经济

①孙点:《缩刊铜板千百年眼跋》,光绪十四年六月跋。

②钱茂伟:《张燧〈千百年眼〉:晚期史学的杰作》,《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

③王鸿年:《日本陆军军制提要小叙》,光绪二十七年序。

学教科书》(1903年),译有《爱国精神谈》(1902年)。

由此看来,在王鸿年、李宗棠和王宰善显赫之前,王惕斋予以了可贵的帮助。他在为王宰善《日本小学校新令》撰写的序中认为,国家办学,旨在敦民俗,开明智,济养民之穷。但“后世重文事而轻实业,州县学校成讲求帖括之地,其于德育、智育已属空谈,体育则尤寂焉无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末教育的时弊,认为教育应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理念新颖。他还认为:“乾留东三十载,明治维新窃幸目睹。每见彼国之公德发达,实业振兴,无不根抵于小学校。至其执干戈,卫社稷,勇侠之风,尤其体育明效。每欲略献刍蕘,终以不知所自而止。”身在异乡,心系祖国的拳拳之心,跃然于纸上。

以上,我们爬梳出清季在日中国人所刻图书,其中,徐承祖8种、黎庶昌18种、罗嘉杰3种、孙点8种、陈渠2种、王肇铨3种、以及王惕斋7种,凡49种。以下试做分析。

第一,从刻书群体构成来看,除王惕斋为民间人士外,其余皆为中国驻日外交官。关于黎庶昌、杨守敬、徐承祖、陈渠等在日开展的访书活动,可参考陈捷博士等人的研究成果^①。笔者认为,外交官刻书居多,除了与他们个人的文化素养、学术嗜好,以及当时日本保存有丰富的珍贵典籍等因素外,也和他们尤其是公使优渥的薪水待遇密不可分。大而言之,当时外交官分正使、参赞、理事(即现在的领事)和随员。其中,正使月薪达1000两库平银(以下同),如第一届至第三届公使何如璋、黎庶昌和徐承祖即是。自光绪十三年第四届公使黎庶昌起,清廷财政绌拮,正使俸薪裁减至800,但仍远高于其他外交人员。当时理事的月薪在200至300之间,参赞为180至240不等,如第一届横滨理事范锡朋300,第四届横滨领事罗嘉杰200;第一届参赞黄遵宪和第五届参赞吕增祥240,第三、第四届参赞陈明远180。与此相比,普通随员的收入更少,第二届随员杨守敬130,第四、第五届随员孙点100,第四、第五届随员王肇铨50,第四届随员陈渠30,与公使的收入相距甚大^②。殷实的基础,为外交官,尤其是公使的刻书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如《古逸丛书》的出版,部分经费虽计入使馆经费,但主要依靠黎庶昌个人的捐资^③。一说为刊刻是书,“(黎庶昌)先生出使,时值艰钜,乃节三年薪俸万数千金,耗二年心力,独成此书”^④。“薪俸万数千金”,相当于黎氏整整一年的薪水。可见没有坚定的信念和相当的经济基础,常人不敢为之。

此外,使馆拥有活字机,也为刻书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第二、第三届使馆随员姚文栋在回忆刊印《经籍访古志》时写道:

①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之研究》有关章节。

②以上驻日外交官的月俸,参见拙著:《清代中日学术交流之研究》第三章。

③参见陈捷:《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之研究》第三部第二章第二节。

④陈渠:《记遵义黎蕤斋先生刊古逸丛书》,陈渠:《灵峰草堂集·东游文稿》,光绪十九年刊。

予忧此书将成广陵散,建议欲速印。适使署有活字机,躬自督工进行,徐星使与其弟乳羔太守亦乐观厥成焉。费绌纸昂,仅印四百部。是为临时校正本,老儒森立夫负其责,年垂八十矣。^①

我们对活字机的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但从姚文栋的不经意的回忆中,获知使馆拥有活字机这一珍贵的信息。

第二,从图书内容来看,家族友人著作最多,达22种。如徐承祖为父亲徐肅出版了《周易旧注》、《读书杂释》、《小腆纪年附考》、《未灰斋诗钞》等4书;黎庶昌除为同出曾国藩门下的李鸿裔出版了《苏邻遗诗》和《髯仙诗舫遗稿》外,先是雕刻《黎氏三家诗词》六种二十五卷,继之扩大规模,整理《黎氏家集》十六种四十二卷。付梓时,黎庶昌还聘请日本著名刻工为之操刀。如木邨嘉平为《长山公自书年谱》、《岭石斋诗钞》、《葑烟亭词》、《慕耕草堂诗钞》、《雪鸿词》、《青田山庐诗抄》、《悦坳遗诗》、《瑟庐遗诗》等8种著书镂板,字体优雅,版式疏朗,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尤其是《黎氏三家诗词》选用白绵纸印刷,在视觉和触觉上,更是锦上添花,堪称印刷中的精品。黎庶昌的随员陈渠曾这样赞美《古逸丛书》之精美:

先生收访之勤,刊刻之精(刊工以木村嘉平为第一),纸墨之良(日本纸以美浓岳雪为无上品。而先生犹精益求精,墨必顶烟,令工细磨,日尽一丸),刷印之善(每工日印,不及千叶。微有损痕及一者,即弃之),无美不备。宜海内有洛阳纸贵之誉也。^②

这里,陈氏赞美的虽是《古逸丛书》,但黎氏对刊刻古籍的精益求精的精神,同样适用于《黎氏家集》。

上述图书都是黎氏第二次担任公使时的成果。如果说,《古逸丛书》是他第一次担任公使时创造的文化工程的话,对自己家族著作的系统整理,是他第二次赴任时留下的主要文化遗产。

此外,出版珍本逸书9种。徐承祖刊行了《经籍访古志》、《通鉴纪事本末》;陈渠推出了北宋本逸书《二李唱和集》、《中说》;罗嘉杰付梓了《离垢集》、《备急灸法》和《针灸择日编集》;王惕斋资助出版了《缩刻铜版千百年眼》、《汉译诊病奇核》等。这说明,域外访书已成为晚清中国人的一种共同的嗜好和文化责任。

在中国人自行刊刻的图书中,唱和类著作8种,亦占有不小的比重。清季驻日外交官多热心于文化交流活动,尤其是黎庶昌,每年春夏两季修楔会和重阳节时,定期举行诗文雅集,将中日唱和活动推向了空前绝后的高潮。黎氏届满凯旋前,明治天皇授予旭一等勋章,授勋的理由是:“庶昌长于翰墨,最善诗。

①姚明辉:《景宪府君年谱》光绪十一年条,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②陈渠:《记遵义黎蕤斋先生刊古逸丛书》,陈渠:《灵峰草堂集·东游文稿》,光绪十九年刊。原文双行小字注文,引文用括号示之。

在任时,屡屡会集日清两国文士举办雅宴,务图两国亲善。每回将赓酬之唱和诗哀辑刊刻,颁布之诗集达数卷。”^①

除上述图书外,赴日中国人还出版了一些自己的成果。如徐承祖出版了他的旧稿——《条议存稿》和《美英条约》,其中《美英条约》为较早将英美条约引进至中国的译著。此外,王肇铨刊刻了地理图籍4种,《日本四大岛全图》和《日本全国海岸图》,为近代中国人自行绘制的第一幅日本地图,具有历史意义;而《图形一斑》,为近代中国较早介绍地图图式的专业图书。王肇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对日本地理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

第三,在出版时间上,上述图书也具有明显的特徵。除《日本陆军军制提要》等5种新学著作问世于1901年和1902年外,其余的典籍多在甲午战前出版。而其中又主要集中在第三届驻日公使徐承祖、第四届公使黎庶昌、第四届横滨领事官罗嘉杰、随员陈渠、第四届随员孙点和王肇铨等6人身上^②。甲午战前共有六届中国外交官驻日,可见徐承祖和黎庶昌担任公使的光绪十年十一月至十六年十二月,形成了刻书高潮。此外,上述典籍刊刻的时间大都晚于第二届公使黎庶昌、杨守敬的《古逸丛书》(光绪十年)。这进一步彰显了《古逸丛书》的意义——既是清季中国人域外访书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最早在日刻书的成果之一,并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效仿。

晚清时期,大约在光绪十年至十六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外交使团在东瀛这块舞台上,演绎了绚丽多彩的文化交流戏曲,而其中的访书刻书,堪称是特色靓丽的一折。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这是一种空前的文化现象,在众葩吐秀的中日交流历史长河中,也极具风姿。历史已定格:其舞台导演为黎庶昌、徐承祖,演员是杨守敬、罗嘉杰、陈渠等。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站在镁光灯下默默贡献的王惕斋。从他的身上,我们依稀可见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经世致用的文化自觉,官民相继的出版模式。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

①《明治天皇纪》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条、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条,吉川弘文馆,1973年。

②孙点和王肇铨虽在第四届和第五届使团亦担任随员,但出版活动多集中在第四届。